

在德黑蘭外交圈 (上)

外交尖兵四十年之八

蔡以典

俄侵伊朗歷史背景

我親身經歷了一九五三年八月的伊朗政變，發現伊共杜德黨在伊朗政局中的翻雲覆雨，使我對伊朗與蘇聯的關係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伊朗的地理形勢，一如我國之與北鄰蘇聯，而蘇聯的支助伊共叛亂，也一如其支助中共叛亂，所以我蒐集了一些有關伊蘇關係的書籍，着手研究伊蘇問題。伊朗與俄羅斯的關係，遠溯自彼得大帝始，彼得大帝向歐亞兩洲擴張計劃的一部份認為俄國應自兩巴（黑海東岸的巴統BATUM及裏海西岸的巴庫BAKU）之間南下達於印度洋，以奪取英國在印度的財富。帝俄於一七二四年即曾侵襲伊朗。

以後的卡賽林（CATHERINE）及尼古拉（NICHOLAS）等俄皇都會不斷繼彼得大帝入侵伊朗，因為他們要繼續推行彼得大帝的擴張計劃。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成功，蘇聯政府成立。為鞏固其政權，宣佈所謂「睦鄰政策」。對於伊朗，由其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加拉罕（KARAKHAN）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照會伊朗，表示放棄帝俄在伊朗所取得的權利。一九二一年二月更與伊朗訂立條約，以完成其睦鄰的「糖衣政策」。而其實際行動，却是派軍進駐伊朗西北部的幾蘭（GILAN）省，並利用伊朗的共黨叛亂領袖組成「伊朗蘇維埃共和國」。蘇軍雖終因內外情勢不許可而被迫自伊境撤退，但已暴露其「睦鄰政策」的虛偽。

一九二〇年九月蘇聯更在巴庫召開「東方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公開宣佈伊朗應「達到蘇維埃制度的成就」。而一九二一年的伊蘇條約，表面上放棄帝俄在伊朗所掠奪的權益，實際上則規定「如第三國利用伊朗作為基地威脅蘇聯的安全時，蘇軍即進駐伊朗」。一九四一年九月蘇軍進駐伊朗北部，就是根據這一條約的規定。這無疑是蘇聯「合法地」侵犯伊朗的領土主權，更是蘇聯對彼得大帝擴張計劃的繼續。

蘇聯與伊朗於一九二〇年建立外交關係，它派駐伊朗的使領人員立即在伊朗全國各地展開特務活動，從事反伊朗政府及反英的宣傳，陰謀將伊朗捲入蘇聯鐵幕之內。

俄製的傀儡杜德黨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列寧逝世，蘇聯國內史達林與托羅斯基從事政權的爭奪甚烈。史達林獲勝，倡導所謂「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一時對伊朗無暇從事政治與軍事的侵略，然而經濟侵略却於此時加強。當時蘇聯貨物在伊朗市場所佔的百分比，從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間的百分之二十三，提高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的百分之三十八。

自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成功以後，各國共產黨都在蘇聯的支助下紛紛成立。當蘇軍於一九二〇年佔領伊朗幾蘭省的時候，伊共於是年七月在幾蘭省的恩則里（ANZALI）城召開大會，並從事公開活動。蘇聯駐伊朗的外交官員對伊共公開贊揚，認為伊共應「策動推翻國王與大地主的權力，並使伊朗從英國強盜政治與經濟的壓力下獲得解放」。伊朗前王李查對伊共的猖獗予以壓抑，伊共竟稱李查王的措施為「白色恐怖」。

一九三二年伊朗與英國由於伊朗南部石油開採的利潤問題發生爭端，蘇聯乃促使伊共利用這一機會從事反英及反伊朗政府的活動，企圖奪取伊朗政權。蘇聯不僅支助伊共從事顛覆政府的活

動，其本身也直接參加伊朗內部的擾亂工作。蘇聯派駐伊朗的使領人員，是公開的特務份子，蘇聯靠伊朗邊境的土爾克曼（TURKMEN），阿塞爾拜然（AZERBAIJAN），阿爾美尼亞（ARMENIA）等地的青年共產黨員利用伊蘇邊境各小民族兩國雜居的關係，派赴伊朗從事秘密活動。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蘇德戰爭爆發，九月蘇聯因伊朗與德國關係密切，乃根據一九二一年伊蘇條約認為威脅蘇聯邊境的安全而進軍伊朗北部，英軍則進駐南部，使伊朗形成一被瓜分的情勢。伊朗前王李查也被蘇英雙方逼迫退位，前王求赴南美，未被允許，由英方將他送往南非的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於一九四四年死於約堡。

在佔領期間，蘇聯軍隊掠奪佔領區的糧食，非法開採石油，強征土地設立農場，控制新聞便利伊共的宣傳活動，更成立伊蘇文化協會，吸收伊朗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以加強伊共的外圍組織。利用宗教及文化團體，以擴展宣傳。

英美兩國於一九四四年與伊朗商談南部石油開採問題，蘇聯利用這一機會，也要求北部石油開採權的讓予。雖然因伊朗政府拒絕未能獲得，但其陰毒的用心，實極明顯。

伊朗前王李查的末期，積極反對共黨，捕殺伊共領袖，摧毀伊共組織，同時伊共的叛亂賣國行為，也為伊朗人民所不恥。當時的伊共，實際上已陷於絕境。蘇軍進駐伊朗北部，把伊共改組為杜德黨（TUDEH 意即人民），於一九四二年

正月正式成立。而領導人仍舊是伊共的領導人。以北部蘇軍佔領區為活動中心，漸次及於中部與南部。

一九四二年伊朗下院議員選舉，杜德黨在蘇軍的支助下獲得一三六議席中的八席。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軍已再無留駐伊朗的藉口，理應自伊境撤退。然而蘇聯政府不但拒絕撤軍，且在伊朗西北部的阿塞爾拜然製造一「自治共和國」，企圖以這一「共和國」為基礎赤化伊朗全境。當時英、美、伊朗分別向蘇聯提出抗議，請蘇聯撤軍。但蘇聯政府故意拖延，以便加強「阿塞爾拜然自治共和國」的力量。最後雖因伊朗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而國際環境也對蘇聯不利，所以它不得不勉強撤軍。但「阿塞爾拜然自治共和國」的叛離運動幾乎使伊朗全部淪入鐵幕。終以伊朗政府應付適當，將這一「共和國」予以消滅，而其經過情形，最足以使全世界人士更增加對蘇聯擴張陰謀的認識。

中伊兩國同樣遭遇

研究伊朗與蘇俄的關係，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我國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的情況，和伊朗沒有什麼兩樣。同樣的是蘇軍延不撤退，同樣的是蘇軍支助當地共黨發動武裝叛亂。所不同的是伊朗發生在西北，而我國發生在東北。蘇軍盤據我東北，當時我是外交折衝工作人員之一，所以對那一段經過，知道得非常詳細。不知不覺地就把我們的情況和伊朗的情況作了一番比較。伊朗的情況是：蘇軍利用一九二一年伊蘇條約的規定，

藉口德國危害蘇聯邊境的安全，出兵進駐伊朗北部，並且在伊朗西北部製造「阿塞爾拜然自治共和國」。第二次大戰結束，蘇軍延不撤退，企圖利用「阿塞爾拜然自治共和國」和杜德黨的活動，赤化伊朗全境。由於伊朗總理卡萬及駐聯合國大使阿拉等的應付適當，一方面向聯合國提出控訴，一方面配合美、英兩國，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終於使蘇軍全部撤退，「阿塞爾拜然自治共和國」亦告解體。雖然其間遭遇無窮的困難，但因外交上高度智慧的運用，使伊朗的領土得以保持完整，不能不說是伊朗政府在外交上的一次大勝利。當時伊朗當政者的老成謀國，實在應居首功。

反觀我國，當時的情況是：蘇軍利用參加對日戰爭的名義進入我國東北，將繳獲日本軍的武器轉交中共匪軍，使匪軍擴大叛亂，對我派軍赴東北接收，百般阻擾，使我軍無法進入。並且延不撤軍，掠奪我工礦物資，運往蘇境。蘇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進入東北，與日本於八月十四日宣佈投降相距僅及五天，蘇軍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才全部撤離東北，盤據期間達二百六十八天，即等於七個月，並非如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向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所作的口頭承諾「三個月完全撤退。」蘇軍在我東北的盤據掠奪，毫無疑問是違背了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假使當時我們一面向聯合國控訴蘇聯違約，一面向美、英兩國迫使蘇軍撤退，可能會獲得一些結果。據說當時外交部各單位所有科長曾聯名上

書當時的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陳明利害得失，提出上述建議。但此項報告送到王部長手上，就石沉大海，毫無音訊。要是當時的外交當局能够審慎考慮，一面立即向聯合國提出控訴，一面暫緩接收東北，使蘇軍進退困難，未始不是一種外交上的運用。等到大陸全部淪陷，再向聯合國第四屆大會控訴蘇聯，時機已失，雖然在聯合國第六屆大會上我控蘇案獲得通過，僅能給蘇聯以精神上的打擊。

當我把伊朗的情況和我國的情況作了一番比較之後，深感伊朗的大臣是老成謀國，而我國當時的外交當局，難免要受庸才誤國之譏。說來真是令人心痛，歷史會有交代的。

代理館務加強活動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夏季，許代辦紹昌奉調回部出任美洲司司長，外交部沒有另外派人來駐伊朗大使館，我就負起代理館務的責任。那時主要的工作，是要爭取駐在國對我聯合國代表權的支持，因為共產集團和一些親匪的所謂第三勢力的國家，每屆聯合國大會都會提出排我納匪的議案，我們一定要打銷這種議案。

把許代辦送走以後，我就開始代館任務。第一件事我每天親自升旗，在許代辦的時候，除了舉行國慶酒會，大使館從不升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代表我們的國家，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大使館，當然要每天升起我們的國旗。其次是展開拜訪活動，包括伊朗各部會首長，宮內大臣（相當於我總統府祕書長），國防參謀兩

部、國會議員、新聞界、廣播界，以及外交團與我有邦交的各館館長。這種活動，差不多花了幾個星期，之後我就開始邀宴。

請客，尤其是外交宴會的請客，不僅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學問。既要考慮客人的身份、地位；也要考慮人與人的關係，有時是某先生甲和某先生乙一向相處不睦，見了面會因很小的事而爭吵，要是在某一宴會場合，同時請了這甲、乙兩位先生，準會弄得主人和客人都很尷尬，把宴會的氣氛也攪得很不愉快，有時是某太太甲和某太太乙，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情形。所以客人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菜餚，因為中國菜世界聞名，我們中國人請外國客，一定要有中國菜，才能使洋人感到滿意。

許紹昌代辦是七月間離開德黑蘭的，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展開拜訪活動，九月初開始宴請賓客，幾乎每個週末大使館都有一次宴會，人數少時候是二十幾人，多到四五十人。宴請伊朗政要，要配合外交團的人士，單獨請伊朗人，他們會感到沒有面子。邀宴的第一個對象是伊朗外交部，其次是宮庭內部和各部會的人士，再其次是國會議員、新聞界和廣播界。

台灣香蕉宴客珍品

因為我經常請客，可苦壞了內子全仁。大使館的廚司是當地雇用的，只能做法國菜，我們是中華民國大使館，請客時一定要有中國菜，才能使客人滿意。每次請客，全仁從採購到做菜都得親自動手，她做的糖醋排骨、燻魚片、炸蝦、紅燒牛肉……等幾道菜，在當時德黑蘭的社交界，是頗

有名氣的。我們離開德黑蘭以後，還有伊朗朋友向中國大使館的同事，稱讚全仁的菜餚。我們請客用的冰淇淋，也是自製的香蕉冰淇淋，伊朗不產香蕉，是進口貨，一隻香蕉的價錢要六到七角美元，所以香蕉冰淇淋在德黑蘭是上品。當客人快要到達的時刻，全仁總是準備兩雙鞋——一雙拖鞋，一雙高跟鞋——放在廚房通餐廳的門旁，到廚房做菜，她穿拖鞋，出來接待客人，她又得改穿高跟鞋，作為中國外交人員的太太，是很辛苦的，既要長於應酬，又要善於烹飪。請外國客人一定要設酒吧，客人到達，不像中國人喝茶，而是喝酒。記得當時總是到德黑蘭的伊斯坦堡大街的市場，去請一位陶保陶保意(TABATABAY)先生約集他的手下來大使館担任侍者的工作。這位陶保陶保意先生手下有二十多位職業侍者，經常為伊朗政府及外交團的宴會服務，他們工作熟練，對一般政要及外交團的人士都非常熟識，甚至對一些人的嗜好，比方說喜歡喝那種酒，吃甚麼菜都非常熟悉。

除了宴請之外，我也在國內購買一些國畫，景泰藍花瓶，檀香扇，小首飾之類的東西，選擇合適的時際送給伊朗的政要，或由全仁送給他們的夫人。這一展開活動，我們在德黑蘭的社交界非常活躍，尤其是和伊朗外交部的關係，特別密切，無論餐會，酒會甚至茶會，都會邀請我們夫婦參加。

爭取支持我代表權

因為和伊朗外交部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

一位聯合國事務司的副司長阿薩 (ASA) 先生成了大使館的好友。記得關於聯合國我代表權問題發生時，我把照會送到伊朗外交部，請伊朗政府命令伊朗駐聯合國代表團予我支持。這一案件由阿薩先生經辦，他辦好給伊朗代表團命令的電報稿呈判時會打電話告訴我們，電報稿判行後發給伊朗代表團，他又會來電話請我們放心。我以一個小小的一等祕書代理館務能和駐在國外交部建立如此的友好關係，內心感到十分安慰。

由於這一事實，使我想起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天，大使館的三朝元老司機（他經過岳崙代辦許紹昌代辦和我三人）忽然問我一個問題：

——代辦先生，我覺得你們中國人好怪。

我聽了一楞，就反問他：

——中國人有什麼好怪的！

——當初岳代辦只跟法國人來往，許代辦只跟美國人來往，而你却和伊朗人來往，這不是很奇怪嗎？

原來岳的太太是法國人，許的太太是華裔美籍，我明白了司機的疑惑，就這樣回答他：

——我的政府派我到伊朗來，我當然要和伊朗人來往。

他聽了我的答覆，只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我知道他並不完全滿意。但我只能說出我自己的行為，不能代替別人的行為作答。

我們的宴飲活動，擴展及於大使館的同事三等祕書史克定兄，他們夫婦也經常請客，每當他們請客的時候，大使館的廚司、僕役，以及餐具、地毯都全部供應，酒品不够，也由大使館取用。

他們夫婦也是十分好客的人，在德黑蘭的社交界也非常活躍，這是工作上的需要，所以大使館全力支持。大部份的應酬，我們夫婦和克定兄嫂同被邀請，因為大使館只有一部車，我們四人總是同去同回。相處的和睦融洽，一如親兄弟。

「原子彈雖小力量大」

代館第一年的國慶節酒會，是在大使館舉行的。外交部只發給三百美元的酒會費用，但我却花了八百多美元。我認為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是國家的大典，不能太寒酸，應該多請一些客人，照外交部發的費用，只能請一百位客人，但我却請了五百多位客人。我夫婦倆花了兩天的時間，把大使館和花園連成一片，花園裏滿鋪地毯，張燈結彩，國旗高掛，並佈滿了小國旗，為了怕下雨，搭起一座巨大的帳篷，設酒吧三處，準備點心和食品飲料。酒會是訂的下午五時半到七時，事先約定，伊朗總理到達即開香檳。我夫婦站在迎賓線上迎接陸續繼續到達的賓客，時間已到六時一刻，胡賽因·阿拉 (HOSEIN ALA) 總理尚未見到臨，我一看手錶，正在焦急，大使館的司機跑來告我：「總理已到，來的人很多。」原來這天下午伊朗政府舉行內閣會議，會議結束後，阿拉總理率同全體閣員來參加中國大使館的國慶酒會，他還帶來了兩位不速之客，他的女兒和女婿，他們是當天從歐洲回到德黑蘭的。我和阿拉總理高舉香檳杯互祝兩國元首政躬康泰，兩國國運昌隆。阿拉總理看了酒會會場的佈置，十分愉快，悄悄地問克定兄：「你們大使館有多少

館員？」克定兄告訴他：「只有代辦和我兩人，還有一個武官處。」阿拉總理笑着說：「原子彈雖小，力量却大。」克定兄當即感謝他對我們酒會的贊美。事後克定兄把這段對話告訴我，我也感到愉快，我們獲得駐在國總理的贊許，辛苦並沒有白花，更增加了他對中國人的認識，這是值得的！

雙十國慶過後，緊接又是新年。大使館按照規定以致送耶誕禮物名義，分別送給伊朗外交部及宮內部的有關單位以洋煙洋酒，這已經成了一種例子，無法免俗。

新年一過，我們又開始社交活動，像日本駐伊朗山田大使到德黑蘭蒞任，我是第一個為他舉行歡迎餐會，當然也利用這個機會請一些伊朗外交部的的人士。美國新任駐伊朗大使柴平 (CHAPIN) 先生到任，我也請他們夫婦。柴平夫人出生北平，自認是半個中國人，但她有早睡的習慣，不喜歡參加晚上的節目，要求我夫婦請她和柴平大使到中國大使館午餐，我們照她的意願做了。從這以後，美國大使館的任何宴會，必定會邀請我們夫婦參加。她對全仁特別親切，好像親姊妹一樣，時常提及：「我是半個中國人。」

外交活動平時燒香

三月二十一日是伊朗新年，外交團要向伊朗國王賀年。上午九點我和克定兄穿上燕尾服，還有武官一同到達王宮，在一間牆壁是用水晶砌成的大廳中等候國王駕臨。由外交部禮賓司的官員和王宮大禮官把外交團排成一個橫排，前排是各

館館長，每館的館員排成直行，次序是按大使、公使、代辦，另外再按到任的年資排列。九時半國王巴勒維蒞臨，從外交團的排頭開始，作檢閱式進行。各館館長代表各國國家元首分別向巴勒維國王祝賀政躬康泰，國運昌隆。館長致賀詞畢，與國王握手，隨即一一介紹館員，分別與國王握手。這項儀式約二十分鐘完畢，國王退出大廳，伊朗外交部長以香檳款待外交團全體人員。約十五分鐘，外交團人員辭出王宮。

這天下午四時，王后蘇娜雅 (SORAYA) 在王宮舉行慶祝茶會，邀請外交部各館館長和夫人參加。我和內子全仁如時到達，又是那間水晶牆壁的大廳，不過上午是空空如也，下午却擺滿了傢俱，餐桌上有各式各樣的茶點，王宮的侍者穿梭在客人中間供應飲料。王后和宮女在門口迎接客人，由王后親手分送每一客人伊朗金幣一枚，我和全仁各得一枚，客人到齊以後分別與王后略作交談，為時約三十分鐘，茶會乃告結束。

我要在這裏特別敘述的，是伊朗外交人員的服飾，雖然也和我們一樣穿大禮服，但他們上衣的袖口和前胸，都綉有銀色的盤花，一些有國王的國家，大都採用這種服飾，我國清朝末年的外交人員也是採用這種服飾。看起來很神氣，也很漂亮。

代館僅僅八個月的時間，在德黑蘭的社交界，我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人物，任何場合人們都稱我 EXCELLENCE (閣下，大人)，這是對大使和部長們的稱謂，我也獲得如此尊稱，真是受寵若驚。這期間大使館的宴會活動，還是照常進行。

我有一個想法：「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絕對不是辦法。我們從事外交工作，要有知己知彼之明。伊朗除了用外匯購買我們的精糖外，幾乎別無所求。而我們每年在聯合國大會的代表權，一定要爭取伊朗的支持。所以大使館必須與伊朗政要——尤其是外交部與宮廷部——維持友好的人際關係，一旦向人家有所請託時，比較容易開口，也比較容易獲得對方的接受。

捐款濟災領先各國

記得這年的七月，伊朗南部發生水災，我利用這個機會，向外交部請示，將大使館節餘的電報費三百多美元換成伊朗幣二千元捐贈給伊朗政府，作為救災之用。本來我想多要點錢捐給伊朗政府，但想到當時政府經濟情況不太好，很難獲得允准，所以就採取動用大使館節餘電報費的辦法，結果獲得外交部的同意。於是就把這筆錢兌成兩千伊朗幣，開具銀行支票，和克定兄一道送交伊朗外交部的秘書長薩米依 (SAMII) 先生。說明這個數目雖小，但却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對伊朗災民一份誠摯的同情。薩米依先生接過支票非常感動，表示數目雖小，但這份友情是非常寶貴的。第二天德黑蘭各報都刊登了我致送捐款給薩米依先生的消息。以後美、英、法各國駐伊朗大使館也先後向伊朗外交部致送水災捐款，數目都是多少萬伊朗幣，我們捐的錢雖少，但却成了對伊朗水災捐款的發起人。所以說，用錢的多或少，固然重要，但最要緊的是用得是不是恰當！我的這一舉措，不僅收到宣傳效果，也贏得了伊朗人的友情。

這年九月的聯合國大會，我向薩米依先生遞交照會，請他對我國的代表權問題予以支持，他一口答應，而且很快就給了我們書面答復。伊朗外交部的組織是法國式，部長是政務官，不太管事。不設次長或副部長，而設有秘書長，秘書長負外交部實際責任權力很大，他答應了的事，多半不會有什麼變化。我們和他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對大使館工作的推進，是有許多便利的。

俄英使館佔地廣大

我們如上年一樣的過了雙十國慶，也過了新年，但等到三月廿一日伊朗新年的時候，却發生了問題，因為伊朗王弟不幸因飛機失事死亡。伊朗政府宣佈國喪，取消新年一切慶祝儀式。伊朗外交部電話通知外交團各館館長，於三月二十二日晨九時到達德黑蘭最大的回教寺，參加王弟的葬禮，規定穿早禮服。我於九時正到達回教寺，回教的葬禮比較簡單，只由教主唱一段可蘭經，接着就出殯，靈柩由八人抬着步行，並不用靈車，我們跟着在後面步行送殯，大約走了兩條街，伊朗外交部禮賓司的人員就請我們不要再送，我也就乘車回館。

因為這趟步行，使我回想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和蘇聯的史大林在德黑蘭舉行會議，據說當時是用高大的布幕圍起，三國元首是在蘇聯大使館和英國大使館之間走來走去的。為了好奇，我特地去參觀了一下那一帶的地形。原來那是丁字形的兩條馬路，蘇聯大使館在橫的馬路上，佔了整條街，從鐵門內望，只看到森林的林木，看不到房屋，據

說裏面有大使館辦公室、大使官邸、職員宿舍、學校、庭院，還有游泳池，小型運動場等等，是一應俱全。英國大使館則在直街的右面，也佔了整條街，兩個大使館的大門相隔只有二十丈左右的距離，難怪可以用布幕圍起，讓三國元首步行來往。

蘇聯駐伊朗大使館，不僅在德黑蘭城內佔地很大，在德黑蘭郊外，還有一所別墅，佔地之大，就像一座城堡，週圍圍以土牆，還有護城河，前後左右四處都有門，可以說是洋洋大觀。我特地到那所別墅去繞了一圈，也使我想起了蘇聯在我國新疆省迪化的總領事館，在盛世才時代，它是新疆督辦公署的太上皇。而在德黑蘭的蘇聯大使館，不也正想像伊朗政府的太上皇嗎？伊朗的北疆與蘇聯接壤，從帝俄到蘇聯，俄國人無時無刻不在企圖併吞伊朗，因為既可奪取豐富的油源，還可以從波斯灣伸入印度洋，控制紅海和蘇彝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對歐洲大陸形成一個從大西洋及印度洋兩面鉗形的大包圍。

蘇聯對伊朗的侵略，是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盡力施為，例如德黑蘭市內，蘇聯設有一所醫院，醫生、護士，一直到工友，全部由俄人担任，對伊朗平民，義務診治，就連藥品也免費供應。德黑蘭的平民每天去看病的很多，當然對俄國人產生好感。這也就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蘇聯對伊朗用心之深，由此可見一般。

提到英國大使館，也有一項特色，它是德黑蘭兩處飲水泉源的一處。當時德黑蘭沒有自來水

，所以水分用水和飲用水兩種。所謂用水，包括盥洗、沐浴、游泳池、花園灌溉……等。德黑蘭的每棟建築，都有地下蓄水池，這種用水，是從山上的大蓄水池流下來的，流放有一定的時間，大約總是十天流放一次。每條馬路的兩旁都有露天的小水溝，並不是下水道的溝，而是為這種水流設置的，每遇放水的時候，每家都很忙碌，要把流經水溝的水引進自家的蓄水池，等蓄水池滿了，又要堵塞住不讓水再流進來。這種水是帶着泥沙一起流的，既要澄清，又要消毒，而且蓄水池每半年要清洗一次，不然會被泥沙塞滿。每家的房頂都有水塔，用幫浦將水從蓄水池抽到水塔，再經過小水管流到各房間，就像我們使用自來水一樣，但不是真的自來水。至於飲用水，則是用大木桶裝好，用馬車運送到每戶人家，多半是三天送一次，水費按月付給，這種飲用水是在廚房裏用磁磚砌一個小型蓄水池備用。水質很好，清澈如鏡，勝過真的自來水。

巴勒維國王的政策

經過一九五三年的八月政變，伊王巴勒維短期逃亡返國後，重掌政權。他勵精圖治，一面與美、英、荷蘭三國合組石油公司，使阿巴丹油田恢復生產，以求解決困難的經濟；一面以皇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並呼籲大地主也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希望逐漸做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藉以改善農民的生活。但是他的革新計劃，却遭遇到極大的阻力。因為伊朗的政局，操縱在兩千個家庭手中，所謂兩千個家庭，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宗教領袖，有的是皇親國戚，有的是工商企業的

領袖。從政府機構到國會，甚至王宮，都在他們的掌握中，他們是既得利益階級，要他們從荷包裏吐出既得利益，真是談何容易。所以他們對伊王的革新政令，陽奉陰違，根本無法貫徹。二十餘年來，伊朗國內的情況沒有什麼改變，這是伊朗政局的悲哀。

伊王在外交方面，也積極活動，他知道伊朗的最大敵人是蘇聯，一方面他對蘇聯表示友善，一方面在國內局勢稍事安定以後，他分別邀請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紹德(SAUD)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九日及土耳其總統巴雅(CELAL BAYAR)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底，先後訪問伊朗，以求達到睦鄰的目的。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存在着波斯灣的若干問題，如巴林島問題，當時巴林島尚未獨立，伊朗認為巴林應屬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則認為應屬沙國，波斯灣名稱問題，伊朗堅持應稱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則要求改名為阿拉伯灣；波斯灣航道的防衛問題；這條航道主要是石油運輸，必須由伊朗與沿岸的阿拉伯國家共同防禦，以保安全。伊朗與土耳其，更是緊鄰，同受蘇聯的威脅。所以在土總統訪問伊朗後，這年（一九五五年）的十月，伊朗就加入了巴格達公約，固然是伊、土兩國有防禦蘇聯的共同要求，但英、美的從旁促成，也是無可諱言的。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